

周德昌 著

中国教育史研究文集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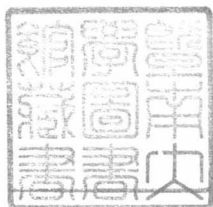
杂志社

G529
20135

阅 览

中国教育史研究文集

周德昌 著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社

2003·广州

目 录

- 著名教育史专家周德昌教授简介 (1)
- 努力提高研究生的教学质量(代序) (3)
- 略论中国古代的德育理论和方法 (8)
- 中国古代教育家论德育的过程和方法 (26)
- 辛亥革命与教育
-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34)
- 论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43)
- 论朱熹的教学法思想 (54)
- 中国古代教育家论教学过程 (65)
- 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 (77)
- 严复教育思想述评 (87)
- 孟子教育思想探微 (100)
- 论康有为、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贡献 (109)
- 重营旧馆喜初成 要共群贤听鹿鸣
- 朱熹的学术渊源和教育活动述略 (120)

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方法论问题	(134)
近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化教育交流	(143)
南宋书院的教学与教育流派的发展	(155)
中国古代的因材施教	(167)
陶行知早期教育思想论略	(177)
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家蔡元培	(186)
南洲讲学开新派	
——教育改革家康有为简论	(198)
古代中国与朝鲜、日本、印度的文化教育交流	(208)
《北宋教育论著选》一书的前言	(238)
中国教育史研究四十年	(243)
荀子的德育理论和方法	(257)
颜之推德育思想论略	(266)
程颢、程颐德育思想论略	(276)
王守仁德育思想论略	(286)
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德育遗产	(296)
近代岭南教育界改革开放的教育意识	(310)
编后记	(316)

著名教育史专家周德昌教授简介



周德昌 男,汉族,1926年7月生,海南省琼山市人。194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教育系,1952年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生毕业后,任教于华南师范大学至今。现任教育系教授,曾任教育系主任;兼任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教育史研究会理事长、广东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广东高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教育学科组组长。此外还担任全国教育

科学教育史学科规划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国教育分支副主编,《教育大辞典》编委兼《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分册》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丛书》顾问,《德育理论丛书》主编等职。

周德昌教授现培养有多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生,任中国教育史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曾讲授过教育学、外国教育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教育史各门分支等多门课程。学术研究方向主要是致力于中国古代、近代教育思想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两宋教育思想流派,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发展史,康有为、梁启超教育思想等领域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是一位国内外有一定声望和影响的学者。

他撰写和主编已经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批判继承》(1982 教育科学出版社)、《中国近代教育史》(1986 湖南教育出版社)、《中国古代教育史》(1988 吉林教育出版社)、《朱熹教育思想述评》(1987 吉林教育出版社)、《一代名师》(1988 河南教育出版社)、《康南海教育文选》(1989 广东高教出版社)、《教育大辞典·中国

近现代教育史分册》(1991 上海教育出版社)、《简明教育辞典》(1992 广东高教出版社)、《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略》(1992 广东教育出版社)、《时代·人才·德育》(1992 中国和平出版社)、《北宋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明清教育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合编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中国教育家评传》、《比较教育史略》、《康有为思想研究》、《外国教育史》等。正在撰写中即将完稿的著作有《岭南教育史》(广东人民出版社)。此外还发表有《中国古代教育家论教学过程》、《康有为、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大贡献》(均刊载在《教育研究》)等学术论文 130 多篇,其中不少被其他报刊所转载。

周德昌教授由于教学、科研成果显著,对高等教育贡献突出,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奖励证书和政府特殊津贴,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还先后获得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教学科研立功奖,华南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等省、校两级的奖励 10 多项。他的主要事迹载入《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中国当代教育名人传略》、《海南名人辞典》等。

(责任编辑 王文宝)

(原载《教育史研究》1995 年第 3 期)

努力提高研究生的教学质量(代序)

周德昌

在培养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的过程中,围绕着培养目标,我们设置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培养计划和方案,并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充实。我们始终把努力提高研究生的教学质量放在首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获得了一些新的体会和收获,尽管它是不成熟的和初步的,我们还是把它写出来请同行们指教。

一、研究方向和课程设置

根据专业特点和导师的专长,我们确定把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和中国近代现代教育思想史作为研究方向。并为研究生开设了下列主要课程(分三类:必修课、选修课和教学、科研实践):

(一)必修课:(1)政治理论课;(2)第一外国语;(3)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史;(4)中国先秦教育思想史;(5)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6)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7)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8)中国教育史研究法。

(二)选修课:(1)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2)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3)训诂学。

(三)教学、科研实践:(1)教学实习;(2)科研实习。

总的目的是:通过三类课程的学习和训练,使研究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打下扎实的中国教育史业务基础和培养其具备一定的教学、科研能力。

二、培养的指导思想

培养中国教育史硕士研究生,我们在指导思想贯彻三个为主的方针:

(一)以掌握原始资料、第一手资料为主。要研究生读原著,如:《论语》、《孟子》、《荀子》等以及《二十四史》中的有关教育部分。这样使研究生直接看到中国教育史的史实和思想的原始面貌,避免被后人断章取义或随心所欲地引用的材料所蒙蔽。

(二)以自学为主,讲授为辅。研究生要独立钻研而学问,要自己站着走,不要别人扶着走。要区别于大学生,要自己学会读书,做札记,使用工具书,做卡片,学习搜集资料等。

导师的讲授是辅助、启发、引路的性质。

(三)以培养研究生的教学、科研能力为主,灌输知识为辅。形象的说,就是要做到三灵:脑子灵,即思想方法灵活,学术思想活跃,有较强的创造力。手灵,即善于写作,笔头快。口灵,即口头表达能力要好。

三、培养的方法和要求

对研究生培养的方法和要求概括起来就是“讲授、自学、讨论、实践、指导”十个字,要抓好这五个环节。

(一)讲授:导师的讲授是一种研究式、诱导式的讲述或谈话。研究生在阅读一定专题材料的基础上,导师做重点的启发、讲解。作为一个有业务专长的导师,应该在讲授过程中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

例如:《孔子教育思想》的专题,导师向研究生介绍当前学术界对孔子教育思想评价的各种看法和分歧。介绍研究孔子教育思想中古今各家的不同注疏或译注。分析孔子教育思想研究中的重点、难点、空白点、突破点,阐述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思想方法论问题等等,引

导研究生独立地去探索和思考问题。

(二)自学:培养自学的能力和习惯是培养研究生的关键环节。只有通过自学,深入钻研导师指定的教学参考书,他们才能深刻地掌握中国教育史知识。自学才能“自得”,才能发挥研究生的自觉积极性。

我们给研究生指定了约 100 本左右与中国教育史有关的专著、教科书、资料汇编等,让他们在三年时间里自学钻研,以便打好牢固的专业基础,并要求他们广泛阅读 300 篇以上的不同学术观点的论文,以便开拓他们的学术眼界和活跃他们的学术观点。

(三)讨论:课堂讨论时,先由研究生自己把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及存在问题向导师及其他研究生汇报,相互交流学习成果。然后,由导师根据讨论过程中的重点、难点以及研究生存在的问题,加以指导性的总结。研究生之间或研究生与导师之间仍有不同意见,则展开适当讨论,但不马上作出结论。这种讨论式的优点是:一是研究生交流了自学心得体会,可以起互相启发、互相促进的作用。二是导师可以从各研究生汇报中了解他们自学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各个人有什么新的见解和存在问题,予以指导。

(四)实践:我们所谓的实践,是教学实习和科研实习,以及一些有利提高研究生教学、科研能力的作业。我们要求每个研究生都要对教育系本科生实习讲课,分二三次讲二三个不同性质和内容的专题。事先都要经过自己备课、导师辅导、试教、正式上课和课后评议几个环节,初步培养研究生在大学讲坛上的教学能力。

科研实习则如组织研究生赴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进行实地考察、调查研究、搜集原始资料等。每届研究生在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前专门有一段时间进行访学考察,到北京、上海、杭州等中国教育史学

科学术力量较强的地点、院校。带着拟好的访学提纲,向中国教育史学界的前辈、同行求教,交流学术观点,搜集论文资料或拍摄图片等。

作业则分期中、期末作业。期中作业范围较小,有读书笔记专题分析等。期末作业多是要每个研究生各人写一篇论文,规定为8 000~10 000字左右,题目可以自定或导师拟定。论文由导师评分。一些质量较高的由导师推荐在研究生学坛或其他刊物上发表。

(五)指导:所谓指导,就是导师在自学、讨论、实践几个环节中都要发挥指导作用。所以指导是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的始终。指导不是独立的或最后的一个环节。指导是对“自发”而言,没有加强指导,则研究生流于“自发学习”,这是导师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

四、养成尊师爱生的学风

养成尊师爱生的学风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尊师使研究生能够虚心地从导师那里学习到业务知识、治学方法和为人师表的品格修养。

一个导师在业务上在某一个领域有所专长,但在另一方面或有所短,一个研究生要善于学习导师之所长。导师还要鼓励研究生向全国的名师学习,向有某一些专长的人学习,兼取众家、百家之所长,学问才能有所长进。

自然尊师并不等于盲从老师。在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不同观点的争论应视为是一种正常现象。师生之间都应该遵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才有利于养成生动活泼的学风。

至于爱生,就是导师要在政治上、业务上全面关心研究生的成长。导师不但要做“经师”,也要做“人师”。用现在的术语来表述:就是不仅要教书,还要育人。

在三年学习时间,我们经常教导研究生要严格要求自己,概括起

来就是六个字：“虚心、踏实、勤奋”。

虚心：知识是一个广阔的海洋，一个人一生懂的东西不过是沧海一粟。作为一个研究生，正处于长知识、长经验时期，因此，无论在做学问方面或是待人处世方面，务必虚心、谨慎。要不耻下问，要虚心向自己的导师、前辈和同行们学习。虚心的反面是骄傲自满，骄傲是会使入落后的，年青人尤其切戒狂妄。

踏实：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飘浮。研究生从第一天进入中国教育史科学研究这个门槛，就应该养成严谨、扎实的治学习习惯和作风。因为从事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无论是史料的搜集、考订，或是材料的加工、分析概括，都要有过硬的功夫。所有这些都是靠一步一个脚印、终年累月地锻炼出来的。

勤奋：“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每一部专著、每一篇论文，都是辛勤的汗水灌溉出来的。每一个研究生都应该像韩愈所指出的那样：“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要经年累月地、夜以继日地孜孜不倦地学习，才算是勤奋。

上述的这些话，就是我们导师奉献给中国教育史研究生为学、做人的格言。

(原载《高教研究》1991年第2期)

略论中国古代的德育理论和方法

道德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现象。它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这些道德观念、规范、原则、标准形成之后,它对社会成员思想和行动起着约束的作用。

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的道德观念、规范、原则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和标准。

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阶级一方面可以利用政权的力量和经济的力量来扩大它们的道德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政权的力量和经济的力量去阻碍被压迫阶级道德观念的流传和削弱其影响。所以,在阶级社会里,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用来作为维护他们统治利益的工具。

我国古代的教育和学校都为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垄断,他们无不把道德教育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也就是说他们都把灌输本阶级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给年青一代作为他们增强教育、教学工作中的头等大事。为此,他们积累了不少经验,形成了一套德育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对这些教育遗产进行整理、总结、分析、批判,并探讨其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看来还是必要的。



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从来都是把德育放在首位的。它们把本阶级的接班人培养具有牢固的立场、观点、信念作为德育的主要任务。

孔丘就是一个明确地提出把奴隶制的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首

位的教育家。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可见，在孔丘的教育思想中，他首先要学生的是第一要做一个符合奴隶制道德标准的社会成员，其次才是学习文化、知识。

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孔丘认为培养奴隶主阶级的立场、观点和信念是最为重要的。孔丘提出“君子”必须是一个“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的坚定分子。所以孔丘要求他的学生深信不疑的信仰奴隶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并努力学习，站稳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以生命来保卫它的完善。

孔丘还经常教育他的学生学“礼”，他认为“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一个人接受了周礼的系统教育，他在政治、道德方面才算“立”得住脚，简而言之，也就是才能站稳立场，具有坚定的信念。如果能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那就达到了奴隶主阶级所要求的最高道德境界——“仁”了，所以孔丘要求他的学生要懂得周礼，要遵守周礼，要维护周礼，务使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要背离周礼的规定，甚至要“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以保全奴隶主阶级的道德气节。这就是孔丘道德教育的中心环节，也是他考察学生的主要标准。

孟轲继承孔丘的德育思想，他同样的主张“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学校教育就是要把灌输奴隶制的道德规范放在第一位。“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梁惠王》）使人们都必须以“孝悌忠信”这些奴隶制的道德来修养自己和约束自己，他认为这就是德育的首要任务。

与孔丘一样，孟轲也要求人们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存奴隶制的道德准则，使之免受损害。“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告子上》）后来成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的最高道德气节，它也是统治阶级实施德育企求达到的理想目标。

南宋的朱熹继承孔、孟的德育理论并加以发展，他把加强封建主

义的德育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救命稻草。在他看来,对人们加强封建伦理纲常的灌输,使它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它所起的作用比封建主义的法制还重要。所以,他说:

“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胜,而患理义之不足悦其心。夫理义不足以悦其心,而区区于法制之末以防之……亦不必胜矣”。(《濂洛关闽书》卷十六)

朱熹所说的“理义”就是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的道教说教,他认为只要这套封建礼教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去,使人们心悦诚服地去遵守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那往往是光靠法制达不到的目的。

朱熹还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关于“天理”、“人欲”的思想,因而,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德育理论。他说:

“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孟子·滕文公上》注)

“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语录》十三)

朱熹所谓的“存天理”,实质就是要求人们牢固树立和信仰封建主义的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并把它当做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信条。所谓“灭人欲”,就是要把一切反抗和违背封建主义政治、道德原则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统统都要禁止,对人们的物质欲望则看成是罪恶,要加以消灭。可见,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德育理论目的在于箝制人民的思想,防止和压制广大劳动人民起来造地主阶级的反。

王守仁则认为道德教育的任务是在于“明人伦”。所谓“明人伦”,就是教导人们明确认识和恪守“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一套封建主义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他公然宣称:“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全书》卷二《传习录中》)“明伦之外无学矣,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全书》卷七《万松书院记》)那就是说教师和学生只能传授和学习封建统治者所规定的封建主义的道德教条,并严格地遵守封建伦常关系。除此之外的言论、思想和行为都是“异端邪说”。他还提出一个“破心中贼”的反动口号,所谓“心中贼”是指那些不利于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思

想,是指劳动人民不能忍受压迫而萌发的造反念头。可见,王守仁的德育思想完全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综合上面论述,可以清楚的看到:

(一)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从来在教育领域中都是把德育放在首位的,并把它作为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统治地位的工具,它的实质就把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以此来禁锢和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二)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它们把培养立场、观点、信念作为道德教育的中心环节,以三纲五常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三)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存天理、灭人欲”。要人们牢固地树立和坚信统治阶级的政治原则和道德观念,把一切违背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 and 行为消灭于萌芽之中。

二

在德育实施的过程中如何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合乎统治阶级所要求的道德标准,成为一个忠于君主,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笃信统治阶级所规定的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接班人,这是一些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教育家十分关注的问题。

根据他们的道德教育的经验,他们把德育的过程概括为“知”、“情”、“意”、“行”的过程。也就是他说的德育的过程中心须抓住认识上的笃信,感情上的陶冶、控制,意识上的锻炼和行为上践履、约束这几个环节,才能使人们的政治、道德修养达到统治阶级所企望的要求和境界。

在德育的过程中,孔丘就是一个十分重视“知”、“情”、“意”、“行”锻炼的教育家。首先,他把学“道”放在首要的地位。他说: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他的学生子夏也说:“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

孔丘和他的学生所说的学“道”，闻“道”指的都是加强或加深对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学习或认识，并要求能达到笃信无疑的程度。

为了陶冶学生的感情，孔丘特别重视“诗”教和“乐”教。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兴”就是说“诗”可以激发人们的思想感情，同时他还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称赞了“诗”的内容是“纯正”的，它合乎奴隶主阶级的道德标准，是进行德育的重要教材。

“成”就是熏陶的意思。通过奴隶主贵族音乐的熏陶使学生具有奴隶主阶的思想感情和道德品质。

为了培养奴隶主阶级的“节操”，孔丘要求他的学生接受严格的意志锻炼。要做到“磨而不磷”，“涅而不淄”，（《阳货》）就是像最坚硬的东西一样，是磨也磨不薄的；象最白的东西一样，是染也染不黑的。要象松柏树一样能够经受得起冬天严寒的“考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子罕》），成为一个支持维护奴隶制的卫道士。

“行”指的是对于统治阶级的政治观念、道德信条的“身体力行”，也就是说要把统治阶级的政治原则、道德信条付诸于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

孔丘也是主张在德育过程中必须把“行”放在重要地位的倡导者，他甚至认为“行”比“言”还更为可靠。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

孔丘的这些言论说明了他主张凡是说出来的自己一定要能够身体力行，凡是自己不能履行的，就不要说漂亮话。他对言过于行的人是不满意的，他认为一个有德行的人，应该是说话谨慎，行动要敏捷，所以古人不肯多说话，是因为恐怕自己不容易做到的缘故。

所以，孔丘在德育过程中，教导他的学生时，特别重视言行一致

的原则。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

意思是说，起初我对于人，是听了他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于人，是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

自然，孔丘所提倡的言行一致，就其内容来说，都不外是孝、悌、忠、信这些奴隶制的道德准则。那都是一些糟粕，但是其中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在德育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在道德修养上做到言论和行为一致，反对言行脱节，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窥测到了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联系性，在这个基础上概括出了言行一致的德育原则，它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和德育理论发展史上是起了很大影响的。

孔丘的后继者孟轲同样的把笃信、维护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信仰和道德规范看得高于一切，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他说：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

在德育过程中孟轲特别重视学生意志的锻炼。他认为一个人只有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坚强起来。他说：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

意思是说一个人所以能成大事，负重任，他必须在困难的环境中，从思想到身体都要经因一番刻苦的磨炼，然后，他的精神才能振奋，意志才能坚强。孟轲所谓的“大任”自然是指维护奴隶制的重任，他认为惟有受过这样严格而又艰苦的意志锻炼，才能成为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的，合乎奴隶制道德标准的坚定分子。

《大学》的作者继承了孔丘、孟轲的德育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使之更为系统和细致。